

2024年3-4月《钟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学》《福建文学》：

“重建”的憧憬与希望

□郭诗亮

这些作品既聚焦于现代生活中被忽视或凝视的群体，关注他们的困境与挣扎，又在叙述模式上探寻新的突破，进而融有深度的内容与有意味的形式于一体，为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启发和感官上的享受。同时，它们对“弱势群体”认同的想象与建构，实则指向全球化时代个体对当下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对“重建”的憧憬与希望

情感的安定。为此，不少小说选择“向后看”，将目光投向以情感为联结的传统生活。盛可以《建筑伦理学》（《湖南文学》2024年第4期）中，在大都市漂泊多年的主人公方紫，因与乡村社会观念的长期脱节，在返乡处理亲属关系时感到焦头烂额。如果说在均质化的社会评价体系中，万紫因占有更多的财富而相比村民更为成功，那么在情感方面，她近乎一败涂地。就此而言，小说书写她的“回归”和向家人的妥协，便既有对全球化时代人们情感缺失的反思，又体现出将人们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传统社会观念下的“弱势群体”的意味。

当然，传统的根系并不总是直接呈现，对另一些人来说，复归传统，且与其他个体达成情感上的共识，并不那么简单。傅友福《龙眼树下》（《福建文学》2024年第4期）中，尽管母亲的突然离世带来“我”身世的谜题，但常年在外打工的“我”，早已于繁杂的工作和标准化的工厂氛围下身心俱疲，无力再去探寻自身的根系。对此，小说只能在主人公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反思的层面上，颇具意味地传达出这样的观念：只有选择去追寻关于身世的真相，“我”才能在亲朋、邻里的和谐互动中，获得某种归属感。

不过，在陈小手《遥夜之聚》（《钟山》2024年第2期）中，真实本身已被看作全球化时代的幻象。在此，个体间的情感联结，只能于一定程度上抵御现代媒介所不断生产的无意义信息的侵蚀。小说中“我”做的母亲将生为手机的梦，便隐喻着人们对全球化的恐惧与抗拒。因此，于“我”而言，不断闪回的关于父母的梦，模糊了现在与过去的界限，将他们和那个记忆中的乡村一同从往昔复活——至少在某些瞬间，迥异于现代世界的那种基于传统社会联系的生活，于想象中再次降临。但小说关于梦和想象的表述，实则也内蕴着经由传统情感联结来建构“弱势群体”认同这一方式的不可能性。

“现代社区”的想象与建构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从熟人社会到非熟人社会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地呈现。在此背景下，寻求一种基于匿名社会的情感交互模式，便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刊物新作中，不少作者试图将“现代社区”作

为“弱势群体”认同建构的场域，并以此开拓人们日渐被挤压的生存空间。傅钰祺《帕格尼尼的大幻想曲》（《山花》2024年第3期）讲述的是小区女物业经理和独居女业主互相救赎的故事，并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探查现代个体走出孤独处境的可能性。小说在对不同身份、代际、地域的女性及其困境的书写中，试图通过小区居民间的社会交往活动，来找到颇具差异的个体间进行对话的契机，从而达到“弱势群体”认同。

尽管全球化经由人员的流动性削弱了传统社区的地方内涵，但同时它也不断形塑着新的社区空间。许玲《月亮在清晨升起》（《湖南文学》2024年第3期）在大都市的医院和夜市间，展开叙述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和他们间的聚散离合。这些话语权的缺失的底层人物，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在心理上呈现出相似的观念和认知，从而一致地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认同。

但恰恰是商业性的凸显，使“现代社区”的建构内蕴着一种隐忧。即人们在共同利益之下构建的脆弱联系，仍然难以缓解他们心中的焦虑、彷徨和孤独无依之感。肖小娜《岔街》（《福建文学》2024年第4期）讲述一条商业街上的小商贩们辛苦生存的故事。尽管这里的人们如同前现代社会的居民般“亲密无间”，然而正如主人公阿木于破产后远遁而来的经历所表现的，这些人的生命体验既大不相同，又难以向人诉说。因而他们始终孤独。在此意义上，“岔街”这一地理名称，既表述着“现代社区”中居民生命体验和情感需求的差异，又象征性地指向“弱势群体”内部难以弥合的裂缝。

《钟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学》《福建文学》近期的作品既聚焦于现代生活中被忽视或凝视的群体，关注他们的困境与挣扎，又在叙述模式上探寻新的突破，进而融有深度的内容与有意味的形式于一体，为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启发和感官上的享受。同时，它们对“弱势群体”认同的想象与建构，实则指向全球化时代个体对当下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对“重建”的憧憬与希望。或许可以说，反思一日不止，对这一命题的探讨，便远非完成时，而是仍然召唤着新的回答。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相较于引领风尚、屹立潮头，《文艺研究》更愿意在热火朝天的论争平息之后，等待学者在情绪稳定时以更具有学理性的姿态展开讨论。这或许有些遗憾，但却更有可能留下学术史上无法绕过的文献

从事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就是阅读编辑部所收到的各类来稿。在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文艺研究》编辑部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数十篇论文投稿。具体到我所负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来说，在通过选题、摘要、引言以及结语等内容进行初步筛选后，每个工作日大概仍然要仔细阅读三到五篇的稿件。尽管并不是每篇论文都需要逐字逐句地阅读才能判断其学术价值，很多时候也可以依靠外审专家的帮助对稿件质量进行评估，但长年累月如机器一般阅读无穷无尽的论文，还是免不了让编辑时不产生职业性的倦怠。

毕竟，在当下“我发表故我在”的学术生态里，毕业、考核、结项、职称晋升、评优评奖乃至参加学术会议等一系列压力或诱惑，让很多学者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制造”出一篇又一篇论文。有些时候，并不是灵感的勃发或学术表达的冲动促使研究者动笔写作，而是发表的压力逼着学者们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这就使得很多论文虽然观点明晰、材料扎实、引证丰富、逻辑严密、注释详尽，却往往语言板滞，看不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和独具特色的问题意识。翻检这样的自然来稿多了，有些时候会让编辑觉得自己的工作简直称得上是沙中拣金。

因此，学术期刊的编辑肯定希望在枯燥、繁重的工作中，能够读到让人眼前一亮、一扫职业倦怠感的好论文。创刊四十余年来，《文艺研究》在办刊方针上，一方面强调“五湖四海”的原则，不搞“小圈子”，倡导多样性，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尽可能广泛地吸纳具有不同治学风格、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则推崇老成持重的风格，不会刻意去追逐学术热点或制造话题。相较于引领风尚、屹立潮头，《文艺研究》更愿意在热火朝天的论争平息之后，等待学者在情绪稳定时以更具有学理性的姿态展开讨论。这样的办刊风格，常常让刊物错失在当代文学史发生变化和转折的时刻留下印迹的机会，这或许有些遗憾，但却更有可能留下学术史上无法绕过的文献，让刊物本身也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

那么，学术期刊的编辑所期待的好文章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方苞在《书货殖传后》中谈及作文之法时有段名言：“《春秋》之制义法，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作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在笔者看来，“言有物”和“言有序”同样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必须符合的标准。对学术论文来说，所谓“言有物”，指的是论述过程中运用充分、确凿的材料，提出具有创见的学术观点；而所谓“言有序”，则意味着在文章中妥帖地安排材料“出场”的先后顺序，使论述层次分明、条理明晰、逻辑缜密，一方面能够有说服力地论证文章的学术看法，另一方面则可以较好地呈现核心论点的学术价值。因此，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未必要去讨论最前沿的文学现象、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或是运用最新的研究方法，但一定要做到“言有物”和“言有序”，将论述的对象放置在学术史脉络上加以讨论，以清晰简明的方式论证文章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并尽可能地说明在何种意义上，这篇论文修正、补充、拓展，抑或是推翻了此前学术界的论断，切实有效地发现新知、推动学术的发展。

当然，在“言有物”和“言有序”之外，如果学者能够在行文中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则无疑会让学术期刊的编辑感到格外欣喜。今天的学术环境里，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刻意与逞才使气的文人保持距离，凸显其学究家的面向。他们笔下的文字确实就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精彩的阐发，但形式上时常表现为引用绵密、理论艰涩、结构板滞、语言缠绕。这种文风固然增加了学术论文的思想密度，却很难使读者产生亲近感，甚至会令读者觉得枯燥乏味、千篇一律。在很多时候，人们阅读这类文字只会对研究者的学识产生敬佩之情，却无法从中触摸作者的个性和才情。审阅各类论文投稿时，期刊编辑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认识作者，难免会压抑不住“八卦”心态，不由自主地试图通过文字揣测作者作者的性情与为人。因此，在逻辑严密、论述明细的基础上，如果论文的叙述能够充满尖新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以及丰满的情感，于学理化的文字中透露出鲜明的个人趣味和风格，那一定是精彩的学术论文。面对数不清的来稿，编辑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职业倦怠的情绪中，如果能有幸遇到一篇这样的好文章，自然会生出冰雪之感，并由衷地感到幸福。

以上几点对于优秀学术论文的理解，对绝大多数刊物都适用。至于《文艺研究》的特色，则是更强调跨学科的视野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一大尴尬，是绝大多数读者只会根据自己的专业，有选择地阅读期刊上的某几篇论文，对其他文章则完全提不起翻阅的兴趣。一般来说，学科分工所形成的厚障壁，是很难跨越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文学虽然有其学科壁垒，但却与物理学、生物学等专业有相当大的区别。在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不是有着高高围城的森严古堡，而是一个疆域广阔的开放空间，可以容纳哲学、历史、艺术、天文、地理、法律、科技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器物、经验与感悟。因此，文学的边界其实从来不是清晰可辨的，它更像是种种来源复杂、多样的知识的交汇点，天然地具有跨学科的属性。作为国内学界为数不多的文学、艺术学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希望刊物上的每一篇文章不仅能够为本专业的研究者带来学术上的新知或挑战，也能让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得到启发、有所收获。因此，《文艺研究》在选题上，希望能够呈现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所交叉的研究成果。只有在跨学科带来全新的视界下，文学研究才能打破封闭自足的学科疆域，带来对文学的全新理解，并进而反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系《文艺研究》副主编，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签约评论家)

李松睿



让刊物本身也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

全球化进程中地区、团体及个体间发展的不均衡，持续加剧着人群的分化，不断制造着话语权缺失的边缘者、底层人，并形塑着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一种消除地方性内涵的普遍化、标准化的时空模式，在建构均质、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过程中，又不断形成对个体的挤压。因而，如何表述全球化时代中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已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之一。五大刊物近期(2024年3月、4月)发表的小说，仿佛不约而同地，在对那些渴求获得话语权的小人物的书写中，探寻“弱势群体”认同的可能路径。

言语交往的可能性与限度

全球化时代，基于地域、血缘的社会联系最大程度地被剥离，孤独的个体不得不直面世界的无限性，并因而总是表现出某种不满和焦虑。在此背景下，言语交往通常被看作个体间进行思想与情感交流的桥梁，能够促使他们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同。王秀梅《奔月记》（《江南》2024年第2期）探讨人力资本流动持续加速的时代中，个体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在主人公俞树这里相遇。他们虽是城市的陌路人，却在言语交往中发现彼此经历的相似性和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从而结为有着微弱联结的“弱势群体”。小说在对他们异于常人的生活态度的描绘中，着力凸显他们与均质的社会观念之间的距离和裂隙，并对他们的未来寄以一定的希望。

对“弱势群体”来说，全球化的推进，意味着他们生存空间的持续缩小。因而不断地言说，便也是他们应对困境的一种方式。王文《小说如何疗愈》（《湖南文学》2024年第4期）中的两个人物，通过共同完成一篇小说的方式，逐渐在对自身的言说中，达成彼此间的同情和认可。小说中刘禹希从国外归来接受“小说叙事疗法”的情节，一方面隐喻着全球化时代个体无可逃脱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则试图传达出言语交往在疗愈个体心灵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此，个体的言说成为他们建构一种“弱势群体”认同，从而逃离深渊处境的前提。

然而言说自身的另一种结果，或许是使个体迷失于无限的话语之中。如何在琐碎的叙述中寻觅真实性和真诚性，是小说中这些小人物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秦汝璧在《五十九度灰》（《钟山》2024年第2期）中将几位来自各地的中年男女置于“封锁”的空间，使他们在绝望的无聊中不断袒露内心。随着故事的推进，那些庞杂的细节不断被剥离，我们看到，在他们不同的心理创伤经历中，掩藏着相似的追求纯粹之爱的渴望。那些缺乏意义与价值的言语，将每个人心中的真实牢牢遮蔽，使他们回到孤独无依的精神处境。“弱势群体”认同的建构，在此陷入困境。

复归传统的期待与难度

面对现实生活的多元、丰富和无限，于有限时空中存在的个体难免感到困惑和彷徨，并因而迫切寻求精神和

评论

《月亮湾》：乡村的暖光与被它照亮的乡魂

□马兵

作家唐慧琴长期生活在乡村，一个时期以来，她的大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都是以独特的内视角，书写着当下农村生活鲜活的波澜，不仅表现着转型期的伦理困境，更探寻着乡民精神重建的光亮。近段时间读到唐慧琴的小说集《月亮湾》（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仍然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一个突出感受是她爱写草木，且常常情意凝滞。这些草木的主人，或者厮守乡土或者远赴城市，无论贫富悲喜，都有一股执拗劲儿，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的痴气；无论经历什么变故和疼痛，他们总会凭借这份执拗和痴气，如草木逢春，让善意荣滋长，在乡土遭遇变异的当下，兀自从大地深处接续一脉灵韵，为美丽的月亮湾重铸乡魂。这些花木所象征的正是这种可贵的德性。如作者谈创作时所说：“多年的乡村生活经验让我感觉到，乡村不仅有迷失，还有持守；不仅有灰暗，还有清澈；不仅有伤痛，还有温暖；不仅有晦涩，还有诗意。”正是这一“持守”“清澈”“温暖”和“诗意”的写作立场，让《月亮湾》摆脱了当下乡土写作既有的若干范式，在众多乡土之作中脱颖而出。

《月亮湾》共收录十篇小说近作，观照的中心乃是当下的乡土伦理。比如《嫦娥奔月》《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作者以平视的目光和同情之心，写出了每一位人物的局促与不安，但最终给读者呈现的还是人心的柔软和人性的宽厚。《嫦娥奔月》有一幕，三伙伴在葫芦娃的茶室里聊天，小石头和葫芦娃都说要“谈理想”，老张哭笑不得：“这俩家伙，心可真大啊，一个儿子在监狱蹲着，一个被债主追得像燕子一样满天飞，还有心思谈什么理想啊。”可是，两人是那样一本正经，葫芦娃希望东山再起后在月亮湾建一个书画院，让月亮湾成为艺术之乡，小石头则希望建一个名叫抱石斋的奇石馆。这处关于理想的讨论，看似高蹈，却妥帖地融入故事中，并凸显了作者对乡土文化重建的特殊观察和思考。在脱贫攻坚之外，在乡土秩序崩

毁之外，还有一个乡民们设想和期待的衣食之上的“理想”，它代表的是被很多乡土写作者无意忽视或有意屏蔽掉的精神性的追求，而给这篇质感沉实的小小说起名“嫦娥奔月”的寓意也正在这里。

当下乡土社会的巨变反映在很多具体层面，比如农业经营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变，乡民关系由熟悉到陌生的转变、社会结构由紧实到松散的转变等等，这些在唐慧琴的小说中都有展现。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大量乡土小说都有类似的情节，但是唐慧琴在处理这一素材时却有自己的思考。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小石头等人物都是“守村者”，他们也曾在外出打工，但生活的重心一直在月亮湾，始终有对故乡的认同和归属，他们守望乡土的动机说不上高大上，只是质朴执拗地坚持自己做人的准则而已，但大多数乡土写作者把重心放在书写农民入城、返乡、空心化等流动经验上，小石头等人的“在地性”经验一向不被关注也就难以获得呈现。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乡民都选择离开村落这一乡土社会的核心空间，正是这些守村者的存在，乡土性才有所依附，村落共同体才能发挥其结构性的调适功能，渐凉的乡情和乡愁才有转暖的可能。我们看到，一方面，性格纯良的小石头病入膏肓，令人唏嘘；另一方面，乡情仍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抚慰，而他们的离去也为村庄注入了强大的向心力，把亲人和乡民们团结在一起。

其次，唐慧琴无意预设一个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二元框架，而是回到乡村的实际，从乡土礼治的重建和人际信任的修复这一考量出发，思考德性、道义这些已被漠视的仁义观念的涵养之功。小石头酷爱奇石、痴迷艺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中的德顺行止有度、干净干练，这说明他们并非传统的老旧农民，他们对诚笃这一底线的坚守也不应单纯理解为传统预制，而毋宁说是乡土伦理构成本然的体现，证明在当下的乡土社会，淳朴敦厚的道义和真正有情的礼俗依然可以成为乡土伦理重建的重要资源，为中国乡土社会内生性发

展的运行机制提供必不可少的滋养。德顺去世后，宝成决定把德顺宅子里的竹子移栽到院来，这当然是象征意味浓厚的一笔，德顺之德自有传人。

小说集《月亮湾》的其他八篇小说均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在情节上也多有映照，比如《好大一棵树》里的苏芸，《长在屋脊上的树》里的小福，《一弯新月挂满天》里的小惠，要么是开了茶叶店，要么是开了茶馆，她们的性情也颇相似，温婉、正直、富有同情心，又有各自的纤细和敏感。这种相似对于作者而言是一种挑战，意味着她需要在近似的情节架构和人物设定中，写出共相中的殊相来。唐慧琴采取的是真正让自己置身其间的内视角，以一个倾听者和观察者的姿态而非代言人的站位去体察这些女子之心的两难，体贴她们的苦衷，也努力捕捉她们的精神之光，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当下乡村女性面临的复杂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写出了问题的深刻和纠缠。相比于其他女性乡土写作者，唐慧琴并不特别在女性的性别意识上用力，很少以身体作为表达手段，也无意强化自己女性写作的立场，但贴着人物的写作站位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乡土之变下女性的别一种疼痛，为讨论女性乡土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女性在乡土文化和伦理建设中的结构性意义等话题提供了很出色的文本。

《苦楝花》和《去高蓬》均在家庭内部展开，聚焦的是家庭亲情的常与变，而两个小说情感调性的不同，正体现了唐慧琴对乡土家庭伦理之“常”与“变”思考的错综，小说中的惶惑与留恋、疏离与回返、审视与依偎，其实也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或者说，她敏感并痛切于当下乡土社会亲情的异变，但还是努力以女性的温婉和慈悲去做缝补修葺，无论结局如何。唐慧琴表现了当下农村的种种苦恼与苦涩，迷茫与彷徨，以及试图穿透它们的“柔软的光影”。这些光虽然细弱，但却却是照亮传统乡村伦理转型的一束束光源。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